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零四期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编者的话：本文讲述的，是六十余年前一位追求民主自由的青年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经历。

在本文开头，作者写到抗战后他家附近新开了一家“生活书店”，在书店里，既有洛克和托克维尔、马恩和毛泽东，又有希特勒和蒋介石。作者本意在于说明当时多元文化的存在，但也多少反映出当时思想阵营的划界：前者是“民主”，后者是“独裁”。“开明人士”把这些东西摆在知识青年面前，知道他们会选什么。

当马恩和毛与洛克和托克维尔摆在一起的时候，致命的偷换就发生了。按照民主阶段论的推演，第一步是混淆，即二者都是民主；第二步是区分，其中一种民主比另一种民主更民主，就是新民主或人民民主；第三步是实现，人民民主就是给广大人民以民主，不给人民的敌人以民主，不但不给，还要对他们实行专政，是为人民民主专政……在混淆的阶段，无论是《新华日报》上赞扬民主的大块文章，还是宝塔山下为美国人和国统区人士准备的招待会，都是为了强调一点，就是天下民主是一家，都是为了反对独裁。

当知识青年在国统区的多元文化之下进行选择的时候，当他们自认为“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保持自由思考和独立的判断力”的时候，其实只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

何止青年？多少学贯中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难免误识为橘，更不用说那些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却周旋其间的美国人。后者通过埃德加·斯诺和费正清的眼

睛看中国，国民党的拒绝改革和腐败无能更加深了他们对另一方的好感，并且以自相矛盾的政策插手陌生的中国事务。于是，在和平民主自由的幌子下，暴力的不宽容的势力和思想占了上风，并开始泛滥。这种思想也渗透了中国的大学校园。燕大以学术自由的名义拒绝了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却抵挡不住另一种党化教育的霸道横行，“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似乎可兼容于“青年团的任务”，概念的混淆莫此为甚：以什么样的真理，得什么样的自由，而为谁服务？从燕园朝霞，司徒梦碎，青春无忧，到再起烽烟，反美巨涛，燕京大学连同它的校训一起覆灭。这一切自然不是阴错阳差的偶然事件导致的。

在本章的结尾处，作者回望来路，不禁感到迷惘：“在燕京这四年，我曾经认为是走着一条自由之路……以后很多年，我仍然不能摆脱一个疑惑：从《别了，司徒雷登》、韩战、到燕京之死，似乎是一串连锁效应；‘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之路中断了。接着，是反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走上了另一条路。”

诚然，这是作者的切身感受，犹如他心中的自由女神在中国的夭亡。但这条路，对于中国之命运而言，虽然弯弯曲曲，其实并不是什么另一条路，而是同一条路；不是自由之路，而是通往奴役之路。

我的燕园岁月

阮铭

海上沉思

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我告别上海，搭上一艘海轮北上。那年暑假我考上了燕京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不久，久违了的朱德勋忽然来到我家。两年前他从震旦附中毕业，我转学到光华附中，彼此就不曾相见。原来他那年考进了燕京大学，现在是燕京大学学生会执

行委员，这回来上海组织新生入学。那时北上的铁路线早已中断，燕大租到了一艘美国海军陆战队留下的登陆艇，载着数十名新生在海上航行。登陆艇是平底的，很宽敞，载重又少，所以出海后船身颠簸得厉害，大部分人晕船，朱德勋也呕吐了，只得躺在舱内。我虽然是第一次搭乘海轮，却未晕船，独自在甲板上，望着浩瀚的大海，陷入沉思。

我的童年和少年，除了父亲去广州的两年回老家金山读书，都是在上海度过的。虽然处于“沦陷”与“光复”交替的黑暗岁月，但上海毕竟还保存着多元的海上文明传统，与北方的大一统长城文明有异。光是上海的新、旧书店，无论日据时期，还是国民党特务横行时期，都能在黑暗的隙缝中，向你提供多元的思维空间。日本投降之后，我家吕班路上又新开了一家生活书店，老板是开明人士邹韬奋。那里有我爱读的中外文学作品，也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有洛克的《政府论》和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也有莫斯科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还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这些多元的思想文化启发了我，使我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保持自由思考和独立的判断力。

现在我要航行到遥远的北方，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是现任美国驻华大使。朱德勋告诉我，新任校长陆志韦，很有正义感。不久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特务在北平进行了一次大搜捕，特务和军警闯进燕京大学，拿着黑名单要抓学生。这时陆志韦挺身而出，拒绝军警特务进校搜查，使黑名单上的学生都得以安全转移。

我还记得，司徒雷登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全国全面内战开打之时出任大使的，当时曾获得各方面的一致欢迎。据说司徒雷登的任命，还是蒋介石无意中促成。一九四六年四月，司徒校长去美国为燕京大学筹募经费返回中国时，途经南京去探望他的老朋友蒋介石。蒋介石早在一九二八年就与司徒相识，司徒称蒋是“一个伟大的人”，认为他“信仰基督教，奉行孙中山的政治哲学和耶稣的教导”。这次重逢，两人一见面就用浙江话交谈（司徒一八七六年生于杭州）。提到马歇尔时，宋美龄在旁以英语问司徒：“你和马歇尔熟不熟？”司徒答：“久闻其名，尚无缘见面。”蒋介石说：“去见见吧！”未等司徒回应，宋美龄即拿起电话打给马歇尔，马歇尔一听司徒要见他，立刻表示“久仰司徒大名，欢迎赐教”。蒋介石即派专车送司徒去见马歇尔。蒋介石的原意，是想让喜欢蒋的司徒接近马歇尔，有助于增进马歇尔对蒋的信任，并未料到马歇尔会推荐司徒出任大使。

马歇尔与司徒一见如故。马歇尔说：“你在中国，美国人把你当中国人。你的思想概念已中国化，对于我这个对中国陌生的美国人，可以帮很大的忙。至于帮什么？你想想，我也想想。”马歇尔让司徒在南京多留几天，他想再谈谈。过了两天，马歇尔约会司徒，一见面就问：“你可不可以做驻中国大使？”司徒婉谢道：“我终生致力教育与传播福音，政治是外行。”马歇尔派专机送司徒回北平。

司徒没有想到，七月四日，马歇尔派专机接他到南京再度相会时，告知他已向杜鲁门推荐司徒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无法推辞，同意只做一年。司徒在致燕京大学委员会请辞校长职务函中说明：

我之被任命为大使和我接受这一使命，完全出于确信此举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你们定已充分警觉到目前的危机，并意识到除非这种危机转化为国家统一与内部和平，否则燕京大学也好，其他我们所关心的事业也好，都是无法继续下去的。我既已被召唤来帮助解决困难，那我是不能拒绝的。我的愿望是在马歇尔将军不辞辛劳地帮助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时候，我能对他有所帮助。经马歇尔将军同意，要求我暂离开燕京大学，我希望能在一年或更短时间内，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返我今天离开的地方。

马歇尔是这样解释他放弃原来考虑的魏国迈，改而推荐司徒出任大使的原因：

我需要这样一位大使的帮助，他能使谈判双方产生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因为他是占有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和五十年在中国的所作所

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一个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他。他大公无私，心中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利益。

两年过去了。在我看来，马歇尔和司徒，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使命的努力是真诚的，也符合美国和中国共同利益。后来我知道，美国政府在讨论马歇尔的赴华使命时，已“不相信委员长（蒋介石）的政府有了美国援助，就能打败共产党”，而“美国政府也不能派遣美国军队到中国作战”；所以“聪明的方针是使中共、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和国民党合成一个统一的政府”。

马歇尔当时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共产党不肯让步怎么办？”答案是“全力支持国民政府，把他的军队运到华北”。另一个是“假如共产党作出让步，委员长不肯合作，使谈判破裂怎么办？”答案是“仍必须支持委员长的国民政府，但不会派美国军队作战”。这就是导致悲剧性后果的根源，马歇尔和司徒雷登虽努力避免，但没有成功。

当我正航向司徒创立的燕京大学时，中共已经不再相信美国。朱德勋告诉我，今年（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司徒按照惯例回燕园过他的七十二岁生日，在他的住处临湖轩会见学生。原来景仰司徒的学生，这回却打出“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标语，在老校长面前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司徒倾听着，偶尔做些解释，随后取消了原定六月二十九日毕业典礼的演说。而两年前司徒七十诞辰时，尚未出任大使，他收到的贺电、贺信，有来自南京蒋介石的，也有来自北平军调部叶剑英的。生日晚宴上，司徒畅谈他在美国筹募经费的活动。司徒说，他打算在燕大文、理、法三个学院之外，“再创办一座立足于美国最新科学技术的燕大工学院；美国的科技界、工业界、教育界都乐意在资金、师资、物力方面予以支持，未来的燕大工学院，将在中国工业现代化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

我这次投考的工科学程（Industrial Technical Program），就是未来工学院的雏形，目前还附属于理学院。司徒本来打算离开燕大一年，帮助马歇尔实现和平使命后，再回来圆他的燕大未来发展之梦，他是把燕大的未来同中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的。

两年匆匆过去，国民党已一败涂地，即使今天想罢战言和，毛泽东也不肯坐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良机。司徒的燕大未来之梦，又有多少实现的机会呢？

燕园朝霞

走进燕京大学校园，有一种宁静幽远的感觉。

第一个早晨，走出斐斋。朝霞照耀在未名湖上，绚烂夺目。我在湖畔漫步，呼吸着北方初秋的清新空气，感受到一种未曾有过的轻松，宛如出笼的鸟儿，从此可以任意飞翔？我记起录取通知书所附资料中那句燕大的校训：“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自由从求真理得来，为了服务人类（或译：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我想，这正是我追求的目标，然而真的能够在这里开始实现吗？

早餐后回到宿舍不久，就听到敲门声。来了两位不相识的高年级同学，帮我们新生办入学手续。他们自我介绍，一位是项淳一，一位是沈善齐，都是南方人。我们很快办完了新生注册和选课，我得了一个学号“48132”。选课很简单，工科学程（I.T.P.）一年级都是必修课，只是根据入学考试成绩，我的大一、大二国文免修，可以选修文科其他课程，我选了“中国通史”。

最后是抽签选宿舍。我和同来的大一新生曹君抽中斐斋楼上的一间，这时帮我们办手续的项淳一和沈善齐提议，把他们各自在六楼（高年级男生宿舍）的房间同我们互换。这样，我就住到了六楼三层，与新闻系四年级学生马恩成同窗。后来我才知道，项淳一和沈善齐是燕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他们住在互不相识的新生宿舍，活动比较不引人注意。办好手续告别

时，沈善齐对我说：“李镇国住在三院，你快去找她吧！”

李镇国是我的大姐，她一九四六年考上燕京大学历史系。那年我转学到光华附中改回原来姓名，她因投考大学不能改名，仍用抗日战争时随父亲改的假名。

我走过未名湖南边的临湖轩(司徒雷登友人捐赠给他的宅邸，冰心命名)，再经适楼(Mrs. Sage 捐赠)，就到了女生宿舍。那是五座封闭的庭院，一至五院。男生不得进入。我到了三院门口，按照沈善齐的指点，按了一下门铃，就有一位女舍监出现，我喊了一声“请找李镇国”，舍监答“请稍候”。

一会儿姐姐出来了，我们已有两年未见。这回离沪北上，匆忙中未及写信，即使写信，一时也寄不到。但姐姐从沈善齐那里得知我已到校。我们在燕园的东南角走了小半圈，经过女体育馆(Boyd 夫妇捐赠)再往南，就是教授的住宅区“南大地”。我们转向东，走到了博雅塔下，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向学校的东门。出了东门，路边有一家小饭店“长顺和”，这是燕大师生常来聚餐的地方，大家都称它的小名“长三”。“长三”的菜色，看起来是普通的家常菜，但烹调技术甚佳。姐姐点了几样菜：白烧白菜、糖醋里肌，还有一样叫“黄小姐菜”，内容不过雪菜、肉沫、酱瓜之类，味道鲜美，据说是一位黄小姐开创而得此名。

姐姐和我边吃边谈。我说，在上海时，夜夜听见“飞行堡垒”开过街道的凄厉之声，到处抓捕学生送进“特种刑事法庭”，投入监狱，押赴刑场，一片法西斯地狱恐怖景象；来到这里，竟像是到了世外桃源。

姐姐说，你别看表面现象，不到一个月前，这里也是一片恐怖。国民党军警宪特打算冲进校园搜捕学生，幸亏陆志韦校长挺身阻挡，又致电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查问，才让燕园免遭劫难。

她说，傅作义虽然不想迫害学生，但他无法掌控全局，北平卫戍司令属于蒋介石黄埔嫡系的中央军，与傅有矛盾；还有毛人凤从南京直接指挥的国民党特务系统暗中监视。这里的国民党特务同上海一样，以一种覆灭前的疯狂报复心态，敌视追求自由理想的青年学生。

然而，我还是度过了两个多月的平静学习生活。工科学程设在燕园东部靠近博雅塔的一座五层小楼，周围四间平房，是一至四年级的实习工厂。一年级生除了一门设计课程需背着画版到工程楼上课，其余课程均与他系同学一起上课。数学课在睿楼，英语课在适楼，中国通史课在穆楼……等等。在西校门内的穆楼上完许大龄的中国通史课，赶到临湖轩的适楼上英语课，要穿过半个校园；我因为在震旦附中的四年学的是法语，英语底子极差，英语课分级被分在最低的J班(A至J班分十级)。

燕大学生的课外活动，是自由参加各种团契。我参加了文学团契“五月社”和歌咏团契“高唱队”。此外就是学生自治会的工作。燕大学生自治会由执委会与立委会组成，相互制衡。执委会由全校师生普选，有竞选活动。立委会是各班级选出自己的立委。这一届选举，姐姐李镇国选上执委，我在自己班上被选为立委。

当我逍遥自在地流连于新的校园生活中时，全国形势已发生急剧变化。在关外，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四野)自九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一日，五十天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五十万人，占据整个东北。在南方，陈毅的华东野战军(三野)和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二野)，十一月初已在徐州一带对国民党黄伯韬、黄维、杜聿明三个精锐兵团共八十多万人展开攻势。燕园内的宁静气氛也动荡起来。一部分南方学生不断接到家里打来的电报，促他们南归。那时燕大全校学生不过六百多人，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离去了一百多人，一部分南归，一部分北上到晋察冀解放区。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姐姐对我说，地下党组织已决定她离开北平到解放区。

一是估计北平解放前，国民党特务系统可能垂死挣扎抓人杀人，姐姐是学生自治会执委，目标较大；二是解放区需要培训一批知识分子干部，以备大城市解放后的文化建设工作，姐姐就是后来随解放军进北平后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的，她到解放区后才改回原来的姓名阮宁。

姐姐走后不久，解放军就到北平西郊。一天晚上，学校通知我们到贝公楼礼堂开全校师生大会。一入场，原来是听解放军代表讲话。来的两名解放军代表，大家并不陌生。一位张光年，又名光未然，是个诗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就是他写的词。另一位荣高棠，原清华学生，在校时因唱一首小曲《卖梨膏糖》出名，遂改名荣高棠。两人在台上，一个文雅，一个诙谐，师生们听得很高兴。他们不是来“接管”学校，而是来安定人心的。学校还是由陆志韦校长和原来的校务委员会管理。地下党组织也暂不公开，通过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准备进北平做市民工作，迎接北平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条件，命令所属部队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那时学校正放寒假，留校学生按文、理、法学院组成三个大队，进北平城向市民宣传新政府的政策，有的街头演说，有的表演话剧、唱歌跳舞。市民看到这些年轻学生不畏寒冷走上街头，对我们报以亲切的温情，常拉着我们的手问：“从哪里来？”“冷不冷？”二月三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我们与市民一起站在街头欢迎。看来对于和平解放，北平市民是庆幸的；对于陌生的新政府，似乎也默默地接受。

寒假结束前，校内掀起了一阵参加南下工作团的热潮，许多学生志愿随解放军南下接管城市工作。但规定理工科学生不能走，应留校学好建设新中国的本领。我的同窗马恩成，是文学院新闻系的一个诗人，他报名南下获得批准，离开了他所眷恋的燕园。但他们没有立即南下，因为蒋介石下野，李宗仁要派代表来北平同共产党和谈，解放军暂没有渡江。他们集中在北平城内学习政策，一直到四月下旬，国民党拒绝了和谈协议，大军渡江时才随军南下。马恩成后来到了广东，当了陶铸的秘书。

春季开学后，燕园恢复了平静。党组织也从“地下”转为公开。那时一批老党员调离燕大，项淳一调到市委研究室，后来当了彭真的秘书；沈善齐调到市青委，做筹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南下工作团又走了一批党员，留下的党员只剩三十多人，成立了党总支，下设文、理、法三个支部。政治系学生林寿晋任党总支副书记，副书记谢道渊（新闻系）、宣传委员陆钦仪（新闻系）、组织委员阮铭（工科学程）、妇女委员龚理嘉（社会系）。

司徒梦碎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发生了一件引起燕大师生特殊关注的事：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跟着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美国驻华大使、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而中共派到南京的军管会外事处主任，正是燕大学生黄华。人们的关注点有三：

第一、美国应该明白，这一动作影响所有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外交代表，采取了与司徒大使一致的立场，致使除了苏联以外，所有外交使团都留在南京了。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政府准备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转而对中共有所期待？

第二、黄华是“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时代的燕京大学学生，也就是司徒校长的学生。当时司徒曾撰文公开赞扬学生的崇高理想，认为“这是中国的希望”。文中驳斥外界对学生“不专学业、热衷国事”的责难，指出“内忧外患一直威胁着中国，而那些不断更迭的政府无力拯救它，难道青年学生不该挺身而出吗？”中共此时派黄华到南京主持外交事务，显然是考虑其特殊身份，便于同司徒进行不拘形式的接触。

第三、对燕京大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佳音。燕京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大学，其生存、发展与中美关系不可分。司徒在请辞校长出任大使时致燕京大学的信中，即指出他之接受大使任命是确信此举符合他“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之利益”。因此可以理解司徒之留在南京，其思虑恐不只于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期待，必亦包含对他“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未来命运的关切。

那时燕大师生，绝大多数是认同校训“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自由派。即使美国教授，也都憎恶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恐怖统治，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在教学工作中坚持思想与学术自由，容许不同学说在校内自由传播，也包括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的思想学说。例如先后担任心理系主任、教育系主任、代理教务长和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的夏仁德（Dr. Randolph Sailer），是司徒校长最信任的教授，他所开设的“心理卫生课”，指定参考书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我也选修过翁独健教授开的历史课，采用的教材有《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党史》四章二节的英译本。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世界上既然存在共产主义学说，人们就应当认识而不是逃避它。

燕大师生普遍认为，要保持学校的自由学风，应让燕大的美国教授继续留下来，贡献他们的学识与智慧，为此建立正常的美中关系是必需的。人们期待着今年的六月二十四日，司徒校长仍能如往年一样，在燕园的临湖轩过他的七十三岁生日。

事情的发展起伏跌宕。

五月十三日，黄华访问司徒雷登，据司徒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黄华详细地解释中国需要与外国有商务往来，及其他关系”，“对于美国在平等互利原则上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问题，黄华表现出极大之兴趣”。

五月三十一日，司徒透过他的秘书傅泾波（黄华在燕大的同学），向黄华提出：“前往上海看看新政权接管后铁路和其他交通工具的状况”，“尤其想同美国公民交谈”。黄华立即做出安排，指派三名人员陪同司徒前往。抵达时，上海外事处的杨刚和《大公报》记者李宗瀛前往欢迎，他们都是司徒器重的燕大优秀学生。司徒在上海会见罗隆基，谈及中国若保持独立不受苏联控制，美国愿提供不少于二十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六月十六日，燕大校长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信中说：“毛泽东已通报你有兴趣访问燕京。我的一位很亲密的朋友前天告诉我，未来燕京的成败可能系于你此次北行之结果。为了中国的利益，特别是燕京，同时也是为了美国，我希望你的访问获得一个巨大的成功，不仅对社会，而且对国际相互了解做出真正的贡献。”

六月二十六日，司徒会见从北平来的周裕康（燕大总务长蔡一谔的亲戚）。根据《司徒雷登日记》，司徒雷登从周处得知“黄华是因为我而被派到这里来的，黄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请求，毛表示我可以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受到欢迎。”

六月二十八日，黄华再度访问司徒雷登，正式转达毛泽东、周恩来邀请司徒访问北平的电报，并表示若乘火车太过劳累，司徒要乘坐自己的专机亦可安排。之后，司徒即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请求批准，报告称：

此行能推进相互之间的更好了解，或可增强中共内部不满苏联的自由主义倾向。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与中共首脑进行非正式谈话的唯一机会。此种机会可能从此不再。这将是一个富有想像力和冒险的象征，显示美国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的开明姿态，并可能令今后的美中关系获益。

这是司徒校长、司徒大使和司徒传教士的最后的梦。他期待着以他最后的生命，来拯救他的燕京大学的未来，拯救他所热爱的中国的未来，拯救美中关系的未来。

七月一日，司徒收到国务院艾奇逊（Dean Acheson）的复电：

“总统训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司徒的秘书傅泾波将这讯息转告黄华时，黄华表示失望且不悦，扔下一句：“美帝国主义本性依然不改！”

一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公布《美中关系白皮书》前夕，司徒雷登启程返美，永远告别了中国。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为他送行。毛泽东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可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

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显然撒了谎。司徒不但有人“理”，毛泽东自己也派黄华邀他访问北平，“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将受到欢迎”。只是在关键时刻美国下禁令而未“理”成，毛赌气不认帐了。

可怜司徒梦碎，回美国三个月即患严重中风，从此卧床不起，留下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

司徒与马歇尔，是两位为中国与世界的自由与和平贡献过不懈努力的历史人物。奇怪的是，中国内战敌对双方的国共两党，却罕见地一致反对他们。毛泽东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司徒与马歇尔身上成了例外。在国共宣传游说的影响下，一些美国学者也是如此。即使在肯定马歇尔于二战与欧洲复兴计划中重大贡献的著作中，也会有一章“使华辱命”。更不用说那些麦卡锡主义阴影笼罩下的军人、政客，攻击“他们的错误使我们丧失了中国，导致美国一连串的失败”。

事实上，马歇尔与司徒，既未偏袒国民党，也未偏袒共产党。他们致力于和平与自由，是为了人民免于战争和压迫，也是为了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与中共“一边倒”向共产极权制度。国民党和美国麦卡锡主义者攻击马歇尔和司徒偏袒共产党，致使蒋介石在战争中失败，是毫无根据的。美国政府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声明公布，自二战结束至一九四八年的短短三年中，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三十八亿八千四百万美元，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国民党军队没有一次战败是由于武器装备不足，以致美国担心供给国民党的武器装备迅速落入共军之手。中国老百姓也都知道“蒋介石是毛泽东的运输大队长”，即使蒋介石自己也表示奇怪：

比较敌我实力，无论哪一方面我们都占绝对优势。军队装备，作战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空军，战车，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国军独有。一切军需补给，粮秣、弹药等，我们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我们何以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实在想不出它有什么道理？

其实马歇尔调停初期，毛泽东对美国有幻想，准备交出武装进联合政府。但蒋介石不愿做戴高乐，非武力消灭共匪不可，置马歇尔多次劝说、警告于不顾，招致国民党丧失政权。

直到中共打下南京，毛泽东对美国仍有幻想。他看到苏联大使追随国民党去广州，西方大使均随司徒留南京，准备亲自接待司徒，自然出于真心，同时派刘少奇到苏联，则是测试斯大林的居心。毛泽东早知道斯大林疑他是铁托，这回要见美国大使，岂不坐实斯大林的疑心。所以那篇“一边倒”的宏文，是安抚斯大林的。然而杜鲁门不懂，以致坐失“美国与中共首脑非正式谈话的唯一机会”。这才是“导致美国一连串失败”的根源。所以司徒梦碎，不只是司徒个人的悲剧，而且是造成此后中国和世界一系列灾难的历史悲剧。那段历史迄今仍笼罩在麦卡锡主义、蒋介石主义、毛泽东主义的迷雾中，我只能以当年的一名学生，在此对马歇尔和司徒两位和平与自由的使者致以敬意。

青春无忧

一九四九年暑假，是一个愉快的夏天。些许的遗憾，是司徒校长没有如愿回校过生日，而且将离开中国。但燕园依然美丽宁静，花儿还是一样地开。大部分同学都放假了，我们“工科学程”的同学还有暑期“工厂实习”。一年级在铸造工厂，实习铸造工艺，也就是“翻砂”。

“翻砂”就是把需要铸造的制品先做成木质的模型，分成两半，分别置入两个砂箱拼在一起，留一条细细的孔道，然后把熔化的铁水从孔道灌入，冷却后打开砂箱，取出制品打磨

干净，就成功了。

工科同学在实习之余，聚在一起做各种表演取乐。三年级的骆传骊扮演陆志韦校长，模仿他去年暑假拒绝国民党特务进校搜捕学生的情景，学着陆志韦的口气，演得惟妙惟肖。在笑闹之中，大家感受到度过了第一个“免于恐怖”的暑假。

那个暑假的招生也令人鼓舞，报考燕大的很多，录取了二百多新生，超过去年。八月底就开始陆续到校的新生，有许多来自上海、南京等不久前才解放的南方大城市，似乎三年前未能实现的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将重新开始，燕大也将在和平民主建设中做出自己的贡献，陆志韦校长也在多方设法加强燕大的师资队伍。在芝加哥大学的赵萝蕤教授，就是一九四九年初才从美国回燕大西语系任教的。

秋季开学后一件大事，是参加天安门的“开国大典”。十月一日凌晨，天未亮，全校同学就在男体育馆操场集合，整队出东校门走到清华园火车站，搭乘火车到西直门，再列队步行进入天安门广场。下午三点，才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是朱德总司令驱车检阅军队。阅兵式结束后，部队先行经过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的群众队伍随后跟进，我们的队伍进行时已是傍晚，突然天空下起倾盆大雨，同学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大家手拉着手，跳着，唱着，高举燕京大学的旗帜涌向天安门。那时天安门上的喇叭大声播出“燕京大学的同学们万岁”！同学们也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万岁”，心中涌起从此可以在祖国大地上自由呼吸的感觉。

那个学期全国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新民主主义”这个名称，在当时很容易被青年学生接受。燕京大学建团开始，就有一百多名同学和青年教师加入，按照团的章程规定，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燕京大学委员会。首届团委书记由谢道渊兼任。文、理、法三学院各设一个总支部，下面每系设一个团支部。那时学校党、团组织的任务是做团结学生和教师的工作，保证学校教学任务的完成，并不干预学校的行政与教学。党团员也与师生打成一片，要求在教学上起模范作用，只有责任，并无特权。

燕京大学的一九四九，平静地过去了。教授们无论美国人、中国人，一样地忙于教学，师生和睦相处，似乎这样的情景将长久继续下去，不是天安门上也喊“燕京大学万岁”吗？

寒假里发生了一件小事，党总支书记林寿晋爱上了一个女学生陈明丽。我认识陈明丽的哥哥陈明格，他是我在光华附中的同学，高我一班，是地下党员，毕业后考上燕京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南下工作团南下了。他的妹妹虽不是党团员，也是进步青年。我不觉得林寿晋同她谈恋爱有什么错，但当时似乎成了大问题，中共北京市委派来一位教育部长孙国梁，开全体党员大会做报告，批评林寿晋是“资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小姐谈恋爱”等等。林寿晋退了党，被调到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来在考古工作中颇有成就。这件事使我对党的生活第一次蒙上阴影。林寿晋离开燕京后，谢道渊专职做党总支书记，我担任了团委书记。

一九五〇年夏季，我在锻造厂实习打铁。实习结束后，参加了团市委主办的高等学校青年团干部暑期训练班。这个训练班设在沙滩的北京大学红楼。那时高等学校的青年团干部都是二十几岁上下的青年学生，思想活跃，工作热情，讨论问题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遇到争执，也毫无禁忌，有一种“做自己主人”的自信心。

训练班指定的主要学习材料，是列宁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演说《青年团的任务》。列宁提出的任务简单、明确，就是“学习”，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武装起来，才能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

在讨论中，对于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这样简单、明确的任务，大家没有异议。争论之点在于：我们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苏联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二者的任务，除了学习这个共同点，还有没有区别？

一位女学生的发言引起我的注意，她提出了学习与启蒙的区别。她说，学习是对一切青年的共同性要求，但中国青年今天还有一个启蒙问题，他们从国民党专制、恐怖统治下黑暗、

愚昧的洞穴中走出，需要一道光，the Enlightenment，照亮他们，让他们独立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眼光去审视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中国青年今天应继承被国民党化教育长期压制的中国启蒙时期五四和北大的科学与民主传统。

接着，我讲了一个故事。十九世纪末，马克思已经去世，恩格斯还活着。美国有一本《新世纪》杂志创刊，编辑部写信给恩格斯，请他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恩格斯回信说，他在《共产党宣言》里找到了一句话，那就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未来社会”。我说，这个方向同新民主主义没有冲突，新民主主义是中国从专制、愚昧走向自由、光明的第一步，中国青年的确需要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来粉碎愚昧与专制的枷锁。燕京大学的校训是“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学习知识，追求真理，是为了获得自由，服务人类，实现每一个人，即一切人的自由。我想这就是我们青年团的任务。

那个晚上，我在红楼前的台阶旁遇到了那位女学生。我坐在台阶上，她躺在台阶旁那条石板斜坡上，我们聊了起来。原来她是北大团委会宣传部长乐黛云，模样是个活泼的少女，白皙的脸蛋，鼻梁周围有些淡淡的雀斑。我只记得她是北大文科学生，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有广泛兴趣，读得多，领会深，让我钦佩不已。

我们谈到五四启蒙时期鲁迅的小说《呐喊》与《彷徨》，她说，鲁迅的《呐喊》把人唤醒，人醒了怎么办？醒来之后无路可走，结果只能是《孤独者》的失败，子君的死，吕纬甫的颓唐。这就是鲁迅的《彷徨》。

她同我一样喜欢《摩罗诗力说》中那几位“恶魔派”诗人。我们谈到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那个头脑清醒、精力充沛的年轻军官皮却林，在黑暗的俄国沙皇时代，那种灵魂中的空虚和苦闷。她说，那也是一种醒来之后无路可走的空虚和苦闷，只能在无聊的冒险和社交场中消磨时光。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这样的典型，被称为“多余的人”。

我们还谈到音乐。我说在中学时常听贝多芬的《命运》，舒伯特的《未完成》，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命运”是“呐喊”，“未完成”和“悲怆”，已是“彷徨于无地”了。

又一个晚上，我们讨论到《未来的黄金世界》，为什么鲁迅“不愿去”？她说，鲁迅看透当时“激进革命论者”向人们许诺“黄金世界”的“虚妄”，他认为革命不是做买卖，为“我们一定胜利”去革命，还不如做买卖的，做买卖还有赔的。鲁迅面对黑暗，所做的是“绝望的反抗”，并不期待“未来的黄金世界”。

我说起《鲁迅书简》中鲁迅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写到，将来无产阶级胜利了，我们不是无产阶级，可能派我们穿上红背心去扫街。

“那我们呢？”

“理论上我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过我也有一点疑问。”我告诉她北京市委教育部长孙国梁的那次讲话，指称党总支书记谈恋爱就是“资产阶级”；讨论时大家没有话说，但心里都有点恐怖吧？

夜深了，虽是夏天，还是有些凉意。我看她躺在石板上，怕会着凉，唤她起来。她说她就喜欢那种冰凉的感觉。

我对她说，我生命中经历过一个绝望的时期，周围都是黑暗，所以接受鲁迅那种做绝望反抗的精神；而她，生活在幸福中的孩子，为什么能如此理解鲁迅，凭灵性吗？

她说：也许是从许多作品中累积的感受，古今中外，思想界战士的心是相通的，再用自己的心去看看周围世界。

训练班结束前，每人要填一份青年团干部登记表。那最后一个晚上见面时，她把自己填的登记表拿给我看。我有点意外地拿过来，一眼看到她在爱人姓名填着：汤一介。我知道这个名字，她是北大教授汤用彤的爱子，家学渊源的青年才俊。我祝福她。告别前，我们唱了一首民歌：

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地开；美丽小鸟一去无踪影，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哔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那时新的战火已在朝鲜半岛燃起，我们对那场战争的后果还浑然不觉。

再起烽烟

对于燕京大学的生死存亡，杜鲁门下禁令不准司徒校长访问北平，是第一个不祥之兆；接着第二个夏季朝鲜半岛之战，则敲响了它的丧钟。韩战炮声响起两年之后，年轻的燕京大学在中国大地消失，它只走过了三十三年青春岁月。

燕京是自由学风的一个象征。燕京是中美思想语言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燕京是中美国关系的一个象征。失去了燕京，象征着失去这一切。无论处于北洋军阀、日本侵略者、国民党专制统治时期，燕京都没有屈服过，然而它终于沉没于韩战开始的反美巨涛。

一九五〇年秋季开学之前，燕园内外都还相当平静。六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主题报告提出需要三年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特别强调“不要四面出击”。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一年内军队复员一百二十万人参加地方经济建设。六月二十五日凌晨韩战开始，周恩来六月二十八日的声明，只针对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插入台湾海峡，指责“美国海军的行动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并未特别关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那时在东北全境，只有一个四十二军在黑龙江从事生产。

九月十五日，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跨越三十八度线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挺进。九月二十二日，美国军机轰炸了中国东北的安东市区，投弹十二枚。这时中共已将原驻广东、河南的战略预备队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调至东北，与原在东北的四十二军组成“东北边防军”，“以防万一”。

燕大校园内，形势也紧张起来，部分美国教授担心战争扩大，与美国的交通中断，急着离校返美。我们的丁荫（Dr. Dean）教授却一如往常，来工程楼给我们授课，似乎外边发生的事情与他无关。

对于这场战争，燕大师生并无思想准备。忽然面对，认识上是迷惘的。据我观察，燕大师生在国共内战中，偏向国民党一边的，已离开学校去了台湾；对国共两党都不相信的，也去了香港或欧、美；留在学校的，大致是不满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期待新政权会带来一点新气象。至于对美国，一般都认同美国自由派的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当时燕大文学院西语系主任赵萝蕤教授，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典型，我是由于做青年团工作认识她的。

西语系的团支部书记雷崇立，是清华大学教授雷海宗的女儿。赵萝蕤是她的老师，她们师生关系很好。雷崇立告诉我，赵萝蕤是北平解放前夕从美国赶回来的，她的父亲是燕大宗学院院长赵紫辰，她的丈夫陈梦家是清华大学教授，同小雷的父亲雷海宗是好朋友。小雷说，赵萝蕤教授不但专业能力强，而且思想进步，非常用功，正在努力用新观点讲授西方文学。小雷曾邀我一起到赵萝蕤家作客。

赵萝蕤家在燕大校园东北角朗润园内一幢教授住宅。小雷和我走到她家时，她高兴地在门口相迎。我看到的是一位美丽端庄的年轻教授，接待学生如同朋友一样，亲切和蔼。

谈话中，她提到西语系美国教授最多，离校返美的也最多，她很着急，正多方设法从国内外延聘新的师资来校。她说，有人怕战争要走，也有她在美国的朋友可以争取回来，她和陆校长都在争取，她不相信美国人会打中国，西语系今后应办得更好。

她还谈到，从美国回来这一年，她读了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对于她理解西方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有新的启发。她研究比较文学，认为不同思想文化都有相通的东西，应当互相补充。她觉得燕大西语系在研究西方文学方面，应当做创新的尝试。

短短一席话，让我感到她是位有智慧和宽度视野，勇于接受新知的勤奋学者，对她自己

主持的燕京西语系的未来，怀抱着理想的目标。

我也谈了点在暑期团训班的收获，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讲的学习人类一切知识才能建设共产主义。我说，马克思对希腊神话和莎士比亚都有研究，他在英国写《资本论》，引用许多莎士比亚的诗句来隐喻他的思想。中国五四时代学者，运用西方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开创了新的学术风气。赵教授的这些看法，我想能对西方文学研究做出新时代的新贡献。

小雷谈了西语系学生的情况。他（她）们大多来自知识分子家庭，求知欲强，要求进步，对未来满怀理想；所以对赵教授提出的西语系的目标，同学们肯定乐意接受。

那天我们谈得很愉快，告别时，赵教授还约我们以后常去，她也是很想了解学生和党、团方面的看法。我和小雷都觉得，那个时期的燕京，老师和学生，党与非党（雷崇立当选西语系团支部书记不久，已入了党，赵教授也知道），是互相信任，真诚以对的，而且都对燕京和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

赵萝蕤教授和陆志韦校长的努力，使燕大西语系师资的实力，没有因美国教授的离校而削弱，陆续延聘来系的有俞大綱、胡稼胎等名教授。还有一位赵萝蕤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时的朋友巫宁坤，一九五一年暑假才自美到燕京，那时校内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校园里来了两位首长，彭真市长的秘书王汉斌和市政府教育局长张文松（彭真夫人张洁青的弟弟）。他们在校内做了一番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燕大师生中存在严重的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几天后，彭真在北京市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给全市大学师生代表做报告，提出“清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树立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的观念”。

其实早在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初，中共中央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布的《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就要求“全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中央军委又做出招收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许多学生报名参加。全校师生还曾掀起购买空军战斗机支援抗美援朝的捐献活动。但燕大师生参与这些活动，主要出自爱国情怀，并未因此否定他们正在研究的美国思想文化的自由传统和先进的科学文明。他们反对的是发动和扩大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彭真报告在全校传达后，引发了热烈的争论。主要的争论有两点：

第一、如何区分帝国主义侵略和美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例如燕京大学，究竟是帝国主义毒害中国青年的文化侵略，还是有益于中国青年接受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事业？

第二、如何定义应当予以仇视、鄙视、蔑视的帝国主义分子？例如毛泽东定义“自由民主的中国”，就提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和罗斯福都是美国总统，是代表美国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分子？

对于这两点争论，在燕京虽无共识，但多数认为，燕京在北洋军阀、日本侵略、国民党专制统治各个时期，面对黑暗势力始终不屈，司徒校长还为此坐过牢；校内也始终保持自由学风，为中国造就了大群自由战士和优秀学者，当然不能视之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

同理，对于美国学者、教师、传教士，以至官员和总统，也不能随意定义为“美帝”予以“仇视、鄙视、蔑视”。他们多数是中国的的朋友，敌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是极少数。比如麦克阿瑟，他把战火延烧到中国边境，主张联合蒋介石军队作战，把战争“扩展到中国沿海和内陆，让红色中国立即崩溃”。大家认为，这位将军虽是反法西斯战争中备受尊敬的英雄，但在韩战中却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者。

事实上，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初，麦克阿瑟就因擅自发表违反美国政策的主张被免除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远东总司令、美国远东陆军总司令四项军职。燕京师生可以接受麦克阿瑟是“美帝”，为他被免职松了一口气，却难以否定司徒雷登、马歇尔是朋友。我

认为这很自然，不仅出于感情，也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自己也常说，他没有苏联朋友，他的朋友是美国人。谁是毛的美国朋友呢？

美国军事视察组到延安时，毛给《解放日报》社论标题《欢迎美军视察组》亲笔加上“战友们”三个字。毛同“美国战友”相处融洽。一九四五年一月，美军视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Kaymond Cromley）致电重庆美军司令部魏德迈，转达毛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把他们作为一个主要政党领导人接待，毛泽东同周恩来愿一同或单独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会谈。”魏德迈收到那份电报，与赫尔利大使商量后隐匿未向华盛顿报告。一九四九年六月，毛还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表示“将像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那样接待他”。显然，毛泽东自己也把美国的军官、总统、大使视若“朋友”而非“美帝”，采取友善而非“仇视、鄙视、蔑视”态度。

暑假开始时，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我和小雷又去看望赵萝蕤教授。她还是那么安详，西语系经过她的努力，师资阵容整齐坚强，她对西语系教学跟上新的时代深具信心，认为中美紧张在停战后自然也会过去。

然而，燕京的情况似乎未能令彭真满意，一场未能预料的风暴将在一九五一年秋季来临。

反美巨涛

一九五一年秋季，彭真派了张大中、彭珮云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到燕京大学“蹲点”。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即“清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也可以说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先兆，斗争了三个大知识分子——燕京校长陆志韦、宗学院院长赵紫辰、哲学系教授张东荪，三个人都是自由民主派，帮助过共产党，又是司徒雷登的朋友，自然与美国的官方与民间均有联系。

工作组的正副组长，都是当年领导学生民主运动的地下党员，是我熟悉的人。张大中后来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彭珮云是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后来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学校支部工作科，她的丈夫是彭真秘书王汉斌，她曾邀我在周末同她一起到颐和园畅观堂游玩，那是在颐和园西南角一处不开放的楼堂，每逢周末，彭真常在那里休息，我就是在那里认识彭真的。

工作组来燕京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他们一开始也未必清楚。初来时，工作组不过四、五个人，我只记得有一个老头，是教育部来的，叫徐宏九，因为年纪大、话又多，所以比较有印象。彭真派他来“蹲点”，恐怕是对燕京不放心。因为那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中国已在朝鲜半岛同美国打仗，燕京的状态究竟怎样？需要“调查研究”，才能决定“方针政策”，所以来了之后，起初只是通过学校党团组织，进行“思想教育”，也就是“学习讨论”。指定的学习资料之一，就是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

那时敏感的人，也许会联想到燕京的命运，从“别了，司徒雷登”到“别了，燕京大学”。然而我没有，我总认为燕京向来是中国黑暗时期的一片自由园地，我们消灭了黑暗，怎么会消灭这片自由园地呢？

经过一段学习讨论，工作组把矛头指向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指的“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而且选定了三个目标，就是陆志韦、赵紫辰、张东荪。

那时我分工了解学生思想状况，每晚单独向彭珮云汇报；有时也通知我参加夜间工作组向张大中的汇报会。汇报会在临湖轩原来司徒雷登校长住宅的会议室，那里已是工作组的驻扎地点。汇报从晚上八、九点开始，往往要到午夜后才结束。我白天上课，那时已很疲倦，常打瞌睡，我看见别人也有睡着的。记得有一次到午夜时，徐宏九老头的汇报让大家一扫瞌睡。

原来燕京校长办公室有一位老秘书杨汝信，是地下共产党员，从司徒雷登到陆志韦，他都经手燕京与美国之间的往来电报。徐宏九说，这位同志思想不敏锐，对经手电报内容毫不在意。经徐宏九开导，杨汝信翻箱倒柜，把他经手的一大批电报找了出来。徐宏九一看，除了燕京与美国托事部（主管燕京财政、事务的机构）之间一般事务和金钱往来之外，还有一些带有中美之间的情报活动性质。徐宏九念了几份，其中涉及陆志韦和张东荪向美方透露中共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一些内部谈话，引起了强烈关注。

这次汇报会后，工作组迅速扩大到二十余人，公安情报部门的干部也参加进来。那时“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展开。工作组根据彭真指示，燕京大学的“三反”运动，应同清除亲美、崇美、恐美反动思想的斗争结合起来，于是一股反美巨涛汹涌而至，终将席卷燕京而去。

自一九五二年开始，在贝公楼礼堂连续开了三次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第一次批判张东荪，第二次批判赵紫辰，第三次批判陆志韦。

张东荪早在一九三〇年，即接受司徒校长之邀来燕大哲学系任教，是司徒最信任的中国教授（另一位是陆志韦）。张东荪又是中共的友人，抗日战争期间就与中共秘密合作，组织燕大学生前往中共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张东荪因拒绝接受伪职，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受刑，坚贞不屈；出狱后，继续与中共接触，派人与彭德怀签订《七七抗日协定》（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国共内战期间，张东荪反对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致张君勱表明“民社党交出名单之日，即我脱离民社党之时”。一九四九年一月，张东荪受傅作义委托，参与同中共的“和平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张东荪被列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之一（委员共五十六人，主席毛泽东）。张东荪的政治立场，可以概括为“亲（中）共、反蒋、亲美、反苏（共）”。他的哲学著作《唯物辩证法论战》，曾引用一句题词：

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柯亨语）。

然而张东荪反苏共不反中共，他认为中共并非苏共附庸，毛泽东如同南斯拉夫的铁托；并且致力于维护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主动在中共与美国之间传达讯息。

这样的角色，当中共需要同美国保持某种接触的时候，是需要的，所以张东荪能够当上政府委员，享有同毛泽东、周恩来对话的权力。韩战之后，中共与美国为敌，这样的角色不再需要；而张东荪仍坚持他的亲美、反苏立场，让自己成了美国国务院《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寄予厚望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中共就难以容忍了。

批判张东荪的大会有二十多人发言，有的声色俱厉，滔滔不绝；有的被迫表态、言不由衷。从下午两点开到七点。批判调子最高的是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给张东荪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四项大帽子。当时还曾传出公安部查获张东荪犯有出卖国家重要情报的间谍罪行，被周恩来阻止继续追查。从后来美国解密的档案看来，张东荪在韩战之前，的确向美国方面透露中共高层的一些重要讯息。例如：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国务卿电中提到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报告：“张（东荪）昨天见到周恩来，后者特别在与外国的贸易问题上提出能够接受的姿态。他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这样的人，已意识到重建贸易和对外关系的需要，但尚未达到足以将他们的观念和判断加到比较下层的地位。他强调目前在如何对待美国的问题上，已存在调整的趋势，但共产党人行动很慢”。（FRUS, 1949, Volume VIII,p,350）

又如，柯乐博一九四九年六月九日致电国务卿：“张宗炳（张东荪之子）告知，周恩来最近对教授们的演讲中，说到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走铁托主义路线。张说此番解释不符合实际情况，据他父亲（张东荪）的看法，事实上共产党人正在走这条路线。”（FRUS, 1949, Volume VIII,p,377）

张东荪、张宗炳父子这种与美国外交人员之间的沟通管道，显然符合中共与美国双方的共同需要，也可以视作中共间接向美方传达信息的特殊管道。这种管道中共虽不愿公开承认，但周恩来心知肚明，才阻止公安部门追究。张东荪被批判后，仍住在燕园教授住宅，工资待遇未变，只是一九五二年底辞去了中央政府委员职务，一九五八年调至中央文史馆。然而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历史事实中共都不认账了，一九六八年一月，张东荪、张宗炳父子一起被捕入狱，那时张东荪已八十二岁高龄。据说张东荪在狱中得悉尼克松访华，曾喃喃自语：“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

大会批判张东荪之后，接着批判赵紫辰，最后是陆志韦。陆志韦是位有正义感的学者，不像张东荪那么热爱政治，大会集中批判他的“亲美反动思想”。陆志韦的“亲美”，珍惜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比较更着眼于燕京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比张东荪获得更多同情。批判陆志韦大会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场面：一个是他的女儿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他的父亲；另一个是大会宣布工科学程主任丁荫教授是美国间谍，被公安人员戴上手铐带走。

三次批判大会之后，各系都展开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亲美反动思想的检查。文、法学院的一些课程被停止上课，西语系是重点之一。小雷和我最后一次去赵萝蕤家看望时，感到她已失去过去那种乐观与自信。她的父亲赵紫辰和陆志韦校长遭大会批判，对她是重大打击。她身为西语系主任，既要检讨自己，还得领导系内的教学检查，被迫停止某些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观点的课程，做其他教授的思想工作。她感到迷惘，失去了西语系未来的目标。

那时我和小雷只是做青年团的学生工作，并非工作组关注的重点，只是组织学生学习讨论，检查自己有没有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怎样树立仇视、鄙视、蔑视美帝的立场？大家以为一过暑假，秋季开学，新生入学，一切都会回归正常。忽然有一天，张大中、彭珮云从彭真那里开会回来，把我们召集到临湖轩，宣布中央决定撤销燕京大学，全国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将从沙滩迁至燕园，燕京的文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

韩战引发的反美巨涛席卷而去的，不仅是年轻的燕京大学，而是整个多元化高等教育体制的消失，中国从此跨进高等教育全般苏化的历史阶段。

在燕京这四年，我曾经认为是走着一条自由之路，就如中学时唱的那首歌：

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忽然狂涛激浪，把前面的路淹没了。该往哪里走？我感到迷惘。以后很多年，我仍然不能摆脱一个疑惑：从《别了，司徒雷登》、韩战、到燕京之死，似乎是一串连锁效应，“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之路中断了。接着，是反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走上了另一条路。

作者简介：

阮铭，1931年出生，曾担任燕京大学团委书记、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先后在《北京日报》社、中宣部、中央党校等单位工作。1988年旅居美国。